

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 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

王 德 文

【摘 要】 随着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阶段,人口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低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在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将会诱发工资率的不断上升。在劳动成本上升和养老负担加重的情况下,保持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关键词】 低生育率 劳动力供给 劳动力需求 劳动生产率 经济增长

【作 者】 王德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推开、经济改革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对家庭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人口出生率继续保持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诱发了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在这个过程中,婚育年龄推迟和城市文化影响进一步加速了中国人口转变进程。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口增长率下降到1%以下,基本完成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型式的转变。

2005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已上升到7.7%。大量预测表明,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将进一步放慢,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仍不断创造出新的劳动力需求。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必然带来工资率上升,诱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问题。

工资上升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工资上升能够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刺激劳动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工资上升也带来了劳动成本上升,削弱中国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优势,对出口和经济增长起到制约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城镇实际工资增长进入了高增长时期。这种高增长如果得益于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它无疑能收到工资和经济同步增长的双重效果。然而,对劳动生产率的分析表明,工资增长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如果讲中国目前的工资快速增长是对过去偏低工资水平的一种补偿的话,那么,这种增长势头在今后应当放慢。否则,它会侵蚀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中国经济的竞争能力。当然,如果能做到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者技能提高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匹配,中国就可以实现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齐头并进。

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人口老龄化加快将会加重养老负担,削弱经济增长动力。目前,中国尚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最后阶段,我们应当通过充分就业的政策来挖掘尚存的人口红利。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面临劳动成本上升和养老负担加重的情况下,要实现

经济持续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一、人口低速增长与劳动力供给

中国人口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出生率保持在30%以上。加之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使得各种急性传染病很快得到控制,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8%,人口增长出现了第一次高峰。1958~1961年是中国人口发展非正常时期。由于政策方针失误和自然灾害影响,人口再生产的自然演变过程被中断,死亡率异常上升,1960年达到25.43%,导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此后,中国人口在死亡率保持低水平的情况下,出生率大幅度下降,结果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1998年的10%以下。21世纪初以来,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见图1)。预测表明,中国人口数量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高峰,此后,人口总量开始逐步下降,由低水平增长阶段过渡到负增长阶段。

人口数量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低增长。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早于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之间便有一个时滞,两者随着时间变化并不同步。生育水平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总人口更快地进入低增长和负增长的阶段。

如图2所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2015年前后,一直处于上升阶段,从3.4亿上升到10亿左右。2015年之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处于不断下降趋势。从增长角度看,劳动年龄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这种快速增长阶段持续了40年左右。21世纪初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处于不断减速态势。这种态势大约在2015年前后开始转变为负增长阶段,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相比之下,人口数量增长将在2035年前后才开始出现负增长状态。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2左右,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总和生育率。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郭志刚等,2006),一些学者利用调查资料和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的推断结果,也支持上述结论。从中期或短期估计来看,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为15~64岁年龄组的人口数量,采用1.6或1.8等较低总和生育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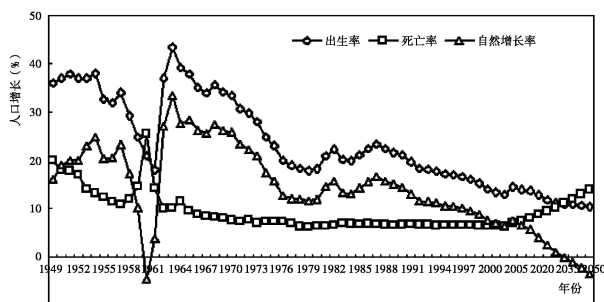


图1 1949~2050年中国人口增长状况

资料来源:1949~2004年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2005~2050年数据来自UN Population Projection,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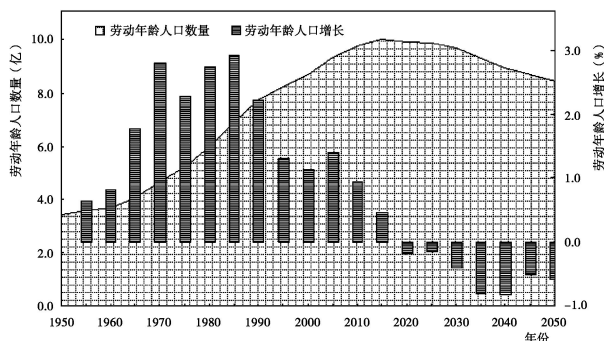


图2 1950~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其增长状况

资料来源:UN Population Projection,2006。

对未来15年中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影响不大,但对人口数量增长和15年之后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有较大的影响。本文主要根据总和生育率为1.8的预测结果来分析未来15年内劳动力供给变化情况。

实际上,劳动年龄人口供给是一个潜在的劳动力供给数量。这部分人口并不都是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在这部分人口中,真正属于劳动力供给部分是那些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的人口。因此,在预测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之后,我们需要利用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对其进行调整,将潜在的劳动力供给数量转化为有效的劳动力供给数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参与率呈不断下降趋势。1990~2004年劳动参与率从85.6%下降到81.9%。这种下降趋势是由众多因素造成的,主要包括:(1)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下岗失业,使得一部分在劳动力市场上沮丧的工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特别是40~50岁低技能工人和妇女。(2)高等教育扩展之后,延长了部分青年人受教育时间。(3)城镇社会保障体制让一部分人通过享受这种福利而退出劳动力市场。(4)在一部分高收入群体中,家庭分工使部分女性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根据这种趋势,我们对今后劳动力供给预测采取两种方案,一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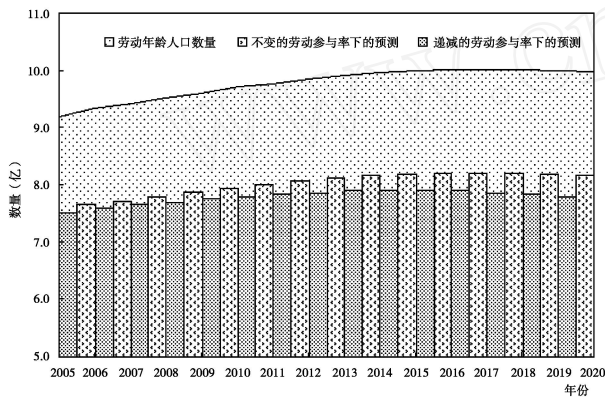


图3 2005~2020年中国劳动力供给趋势

注:根据王广州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

假定今后15年里劳动参与率保持在2004年的水平不变;另一种是假定今后15年里劳动参与率按照过去的趋势递减,这样,到2020年,中国劳动参与率会下降到78.4%。从图3可见,如果未来劳动参与率保持在81.9%不变,那么,今后15年里有效劳动供给数量将从2005年的7.54亿上升到2016年的8.20亿,比2005年多6600万人。在余下的4年中,有效劳动供给数量大体维持在这个规模,并略有下降,到2020年为8.17亿,比2005年多6300万人。然而,如果采用第二种方案预测,今后

15年里有效劳动供给数量到2014年上升到峰值,为7.90亿,比第一种方案少3000万人。到2020年,第二种方案预测的有效劳动力供给数量为7.75亿,比第一种方案少4100万人。

上述两种预测方案都表明,未来有效劳动力供给的峰值在2015年前后,之后开始出现下降态势。从净增长角度看,2005~2015年,逐年增量的幅度不断下降,到2015年之后开始出现负增长。这种变化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保持了一致。不过,与劳动年龄人口相比,第一种方案预测的有效劳动力供给数量与之相差1.66亿~1.81亿,第二种方案预测的有效劳动力供给数量与之相差1.69亿~2.22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劳动力供给正处于重要转折的前期。它与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劳动力需求一起,将中国劳动力市场带入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

二、工资高增长与劳动力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资增长在不同时期是不平衡的。如图4所示,无论是货币工资还是实际工资,在20世纪80年代都保持着相对较慢增长的态势。但从90年代开始,特别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工资变化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如果选择2000年为100,我们可以计算货

币工资指数和实际工资指数。货币工资在改革初期的起点很低,但上升较快,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几乎是翻一番。进入90年代之后,上升更加迅速,到2005年上升到最高点。相对来讲,实际工资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一直保持着更慢的速度上升,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

1978~2005年,中国货币工资从615元上升到18405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3.4%。从时间阶段上看,货币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1978~1985年为9.5%,1986~1990年为13.3%,1991~1995年为21.1%,1996~2000年为11.3%,2001~2005年为14.5%。也就是讲,货币工资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21世纪初期分别经历了两次快速增长。但是,由于这两个时期物价变化不同,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相反,21世纪初期的物价水平变化不大,因此,在比较这两个时段的工资增长时,我们需要消除物价因素。

选用不同的平减指数对计算实际工资变化有所不同。在实际应用中,可采用消费价格指数和GDP平减指数两种办法。如果采用消费价格指数,1978~2005年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0%。由于GDP平减指数包含的商品和服务范围更广,其实际指数数值小于消费价格变化,这样,利用它计算得到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就高一些,改革以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6%。在消除物价因素之后,采用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实际工资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年平均增长5.9%,而2001~2005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为13.2%,实际工资增长率呈现出一路上升的态势。如果采用GDP平减指数,实际工资增长率在1991~2005年间大约保持在7%~11%,近年来也呈现出加速趋势。

分部门和行业的实际工资增长也与平均实际工资增长呈相同的态势(见表1)。分所有制来看,不同所有制单位的实际工资增长总体保持着与平均工资增长相同的趋势,但在增长幅度上有所不同。改革以来,国有单位的实际工资增长最快,其次是集体单位,最后是非国有单位。3个部门的年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分别为7.0%、5.8%和5.6%。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这种改革主要是通过劳动力数量调整,而不是工资调整来提高国有企业效率。通过将富余人员分流出来,以及将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和优良资产进行剥离、重组,经过改制后的国有企业资本有机程度大幅度提高,结果也带来了工资的大幅度提高。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主要通过非国有部门寻找就业机会,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些部门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

分行业来看,所有行业大体上也保持着与平均工资相同的变化趋势。但增长幅度在不同行业之间有较大的差异。与平均工资增长水平比较,在一些竞争性行业中,如农业、制造业、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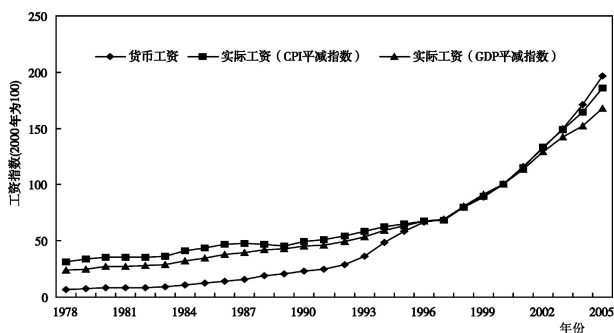


图4 1978~2005年的中国工资指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中国统计年鉴》颁布了实际工资指数。根据这个指数,我们可以计算实际工资的平减指数。将这个指数与城镇消费指数比较,两者在1998年之前基本相同,但在1998年之后有显著不同。本文主要利用城镇消费价格指数来计算实际工资。

表1 1978~2005年分阶段、分所有制和分行业实际工资增长率 %

	1978~ 1985	1986~ 1990	1991~ 1995	1996~ 2000	2001~ 2005	1978~ 2005
平均	4.9	2.6	5.9	9.1	13.2	7.0
分所有制						
国有单位	5.1	2.8	5.0	9.0	13.9	7.0
集体单位	5.3	1.1	3.9	7.7	11.3	5.8
其他单位	—	4.8	5.3	5.9	9.6	5.6
分行业						
农业	4.9	1.5	3.5	5.8	8.7	4.9
采掘业	5.8	4.6	1.8	5.5	18.6	7.2
制造业	5.0	2.5	5.2	9.1	11.3	6.5
电力、煤气和水供应业	1.6	5.6	8.9	8.1	13.1	7.0
建筑业	5.3	1.3	4.6	6.5	9.2	5.4
交通运输通讯业	4.8	2.9	8.3	9.9	13.7	7.7
餐饮零售服务业	4.7	1.9	3.8	9.1	14.5	6.6
金融保险业	5.2	2.1	13.9	10.5	17.8	9.6
房地产业	5.3	5.9	11.3	9.2	9.1	8.0
社会服务业	5.9	11.7	7.4	9.3	13.1	9.2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	5.6	3.7	6.8	11.0	12.8	7.8
文化教育	7.0	2.1	6.2	9.5	13.7	7.7
科学研究	5.2	2.9	8.5	12.4	13.9	8.4
政府部门	3.7	2.8	6.4	10.5	14.2	7.2

注:(1)利用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实际工资增长率;(2)实际工资增长率为年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2001、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代中期以来所有部门和行业经历的一个普遍现象。

在简单的劳动力供求框架中,工资水平的急剧上升是劳动力供需双方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劳动力供给始终保持无限供给状态,随着经济增长创造出来的新增的劳动力需求就会被大量剩余的劳动力及时补充。因此,不会出现工资水平上涨现象。发展经济学中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就描述了这种现象(Lewis,1954),即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中,农业部门有近似无限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存在,这种存在保证工业部门扩展过程始终有廉价的劳动力供给。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现代工业部门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此时,农业部门无限剩余的劳动力供给状态就转为有限剩余状态,现代部门的进一步扩展就面临工资调整问题。

中国是人口数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4年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到1162美元,属于全球国别排序中的中低收入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上,人们通常认为像中国这样劳动力数量众多的国家不存在着短缺问题。然而,从2003年底开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现象。2004年,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福建省的福州、厦门等地。到2005年,上述短缺现象进一步加剧,从珠江三角洲蔓延到长江三角洲、华北沿海地区,甚至劳务输出大省如湖南、江西等地也出现了企业招工困难。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劳动力市场对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加速和经济重心转移的一种市场反映。出口高速增长和新一轮经济增长创造了巨大劳动力需求,在劳动力有效供给难以满足新增需求的情况下,农民工短缺现象不仅揭示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着有限剩余转变(Wang等,2006),而且伴随着这种短

建筑业和餐饮零售业,其实际工资增长相对较慢,而在一些带有一定垄断或非竞争的行业中,如金融保险、社会服务、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等,其工资增长相对较快。1978~2005年,实际工资增长最慢的3个行业是农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其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9%、5.4%和6.5%。实际工资增长最快的3个行业是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业和科学研究,其年平均增长率为8.4%、9.2%和9.6%。

如果计算1996~2005年的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在所有行业中,除了农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以外,其他所有行业的实际工资增长都在10%左右。而这3个行业的实际工资增长也分别达到7.3%、7.9%和9.3%,高于改革以来的各自的增长率。由此可见,工资高增长是20世纪90年

缺,实际工资较快上升也在情理之中。

利用一个简单的劳动力供求预测,可以进一步揭示中国未来劳动力供求形势的变化。假定未来10年里中国经济有高、中、低三种增长可能性,分别对应10%、8%和6%的经济增长率,假定就业弹性为0.1,这样,就可以计算出未来每年新增劳动力需求数量。与高、中、低经济增长率相对应,新增劳动力需求也分别有高、中、低三种可能性。将其与劳动年龄人口和有效劳动供给的预测数据相匹配,就得到新增劳动供给和新增劳动力需求(见图5)。

如图5所示,如果假定劳动参与率为100%,即所有劳动年龄人口都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那么,在最低的6%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劳动力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将在2014年出现缺口。这是劳动力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出现缺口的时间上限。如果假定劳动参与率逐年递减,在最高的10%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劳动力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将在2007年就出现缺口。如果假定劳动参与率保持不变,在中等的8%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劳动力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将在2011年出现缺口。因此,上述简单的劳动力供求模拟也显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处于重要的转折期。

三、人口转变与中国经济增长

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国抓住了收获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机,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分析表明,改革以来,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7.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如果把未来剩余的人口红利也计算在内,人口转变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在1/3左右(王德文等,2005)。

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劳动参与率下降及其带来的劳动供给减少,以及储蓄率下降带来的物质资本积累低增长,这些因素将共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在总要素生产率保持每年3%的增长速度前提下,人口老龄化将使得2010~202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21世纪前十年下降2.4个百分点,21世纪中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到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半(彭秀健,2006)。在这个阶段,中国如何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将在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通过政策和体制改革,加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推进就业结构调整和提高劳动配置效率,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一系列措施。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个人和社会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为个人进入老年阶段做好准备。一种方式是通过社会养老制度福利计划,另一种是通过个人劳动年龄阶段的财务积累。这两种方式都会对资本形成和积累产生影响,从而为收获人口红利创造条件。按照稳态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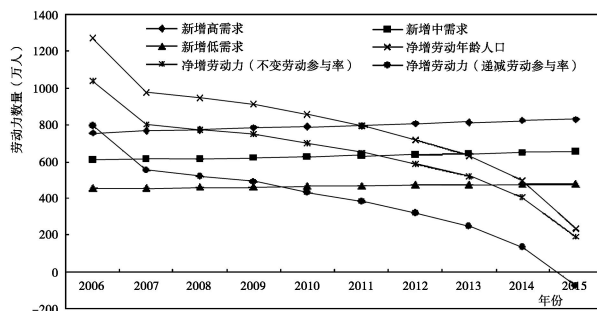


图5 2006~2015年劳动力供求趋势预测

注:(1)劳动需求按照就业弹性为0.1、经济增长率分别按照10%、8%、6%来计算新增的高、中、低的劳动力需求数量。(2)数据由作者计算。

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实际上,就业弹性在近年达到0.15左右。较高的就业弹性意味着图5中的所有新增劳动需求线向上移动。

定律的要求,随着人口条件的改变,资本产出比应从1982年的2.6上升到2050年的7.1,这样才能实现劳动生产率每年1.4%的增长率,保持中国人口和老年人口的福利水平(Wang等,2005)。较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这种增长不仅可以维持工资的较快增长,消除劳动成本上升的压力,而且也可以通过资本积累和财富积累,为老龄化社会准备物质条件。从总体上讲,改革以来中国实际工资水平快速增长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1978~2005年,中国实际工资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7.6%,略低于劳动生产率每年7.9%的增长速度。但是,如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观察,在这个阶段,实际工资增长不仅在总体上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而且从产业内部来看也是如此(见表2)。如果讲这种高速的工资增长是针对中国过去较低工资水平的一种补偿,那么,这种趋势在今后应当有所减缓,否则,这将影响到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当然,并不是讲中国一定要长期保持低劳动成本的

表2 1978~2005年中国的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1978~ 1985	1986~ 1990	1991~ 1995	1996~ 2000	2001~ 2005	1978~ 2005
劳动生产率增长						
平均	6.5	6.1	11.2	7.4	8.4	7.9
农业	8.7	3.9	7.8	2.4	7.5	6.3
第二产业	2.1	5.1	12.5	7.3	8.0	6.7
工业	2.9	5.2	12.0	12.9	—	7.7
建筑业	0.4	4.9	11.9	5.2	—	4.9
第三产业	4.7	6.7	5.8	8.9	6.0	6.3
交通运输通讯业	1.1	4.9	5.8	13.8	—	6.4
餐饮零售服务业	8.4	4.9	7.6	8.4	—	7.5
实际工资增长						
平均	5.6	5.7	7.1	9.7	10.9	7.6
农业	5.6	4.5	4.8	6.4	6.5	5.6
制造业	5.6	5.7	6.4	9.6	9.0	7.1
建筑业	5.9	4.3	5.9	7.0	7.0	6.0
交通运输通讯业	5.4	6.1	9.5	10.5	11.4	8.3
餐饮零售服务业	5.3	5.0	5.1	9.7	12.1	7.3*

注:(1)为了与劳动生产率比较,本表利用GDP平减指数计算实际工资增长率。(2)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实际工资增长率为年平均增长率。(3)因为缺乏分行业的GDP资料,*数据为1978~2002年。

资料来源:2001、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目前这种高储蓄率的情况下,加速物质资本积累今后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提高资本形成效率和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从长期来看,今后提高人均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主要来自就业结构转换、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渠道。

研究表明,改革以来中国部门间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6%~21%(蔡昉、王德文,1999)。这种贡献主要来自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2005年,中国农业占GDP的份额为12.6%,而农业就业比例仍高达44.8%。由此可

制造业竞争优势。问题在于,随着劳动供求关系的急速变化,中国能否通过就业结构调整、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来回应参与国际分工格局的新要求。

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多条途径:一是通过资本积累,提高人均资本拥有量;二是通过就业结构的转换,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三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个人劳动生产率;四是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总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中国的储蓄率已高达43%左右,若继续通过提高储蓄率来增长资本积累,不仅潜力不大,而且也不利于启动国内需求。实际上,随着人口转变,中国高储蓄率在今后将会出现下降趋势。东亚经济的发展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种证据。在中国

政府机关和事业部门涨工资对其他部门的工资上涨起到了示范效应和传递效应,因此,对总体工资水平的上涨产生了重要影响。

见,中国未来就业结构的转换空间仍然很大,并且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世界银行的一份模拟分析揭示,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中国经济增长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World Bank,2005)。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激烈竞争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是以相应技术的获得性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为基础的。假使在相应技术可获得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通过教育、卫生健康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也就无法完成。在工资高速增长带来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原有的劳动成本优势丧失,而新的人力资本优势又没有形成,这样就会带来“未富先老”的窘境。人力资本积累是一个具有报酬递增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一项模拟分析表明,增加教育和培训的人力资本投资将使中国人均收入增长每年提高近1个百分点(Peng,2005)。高盛公司的一份分析报告预测,如果将劳动者质量提高和农业劳动力释放等因素考虑在内,从2005年到2050年中国经济增长每年保持在5.3%,比基准水平高出0.6个百分点(乔虹,2006)。人力资本积累除了自身构成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外,它也会通过总量增加所带来的外部效应,推动科技创新水平和知识积累速度。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的重要变化,让过去依靠丰沛劳动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逐渐式微。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来看,人均自然资源缺乏对经济的影响日益突出,这主要表现在能源、矿产等供给对高速增长的支持能力不断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增长本身就会诱发形成转变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讲,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需要从依靠投入扩展转向劳动生产率提高(蔡昉,2006)。技术进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体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自然资源使用效率和创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保障。从这个角度讲,建设创新型国家与构建和谐社会是相一致的。不过,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要依据经济发展阶段和创新能力,对创新体系建设和创新战略有科学的认识。就中国而言,加强对技术创新的国内需求和技术使用能力是关键。

四、结论性的评论

在一个简单的劳动力供需变化框架下,本文揭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转折阶段。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人口转变进入低生育率阶段,造成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低速增长;另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增长不断创造出新的劳动力需求。正是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实际工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如果考虑劳动参与率下降等因素,中国未来劳动力供求缺口将迫使工资率继续上升,进而带来劳动成本的不断上升。比较分析表明,无论是总体水平还是分部门来看,实际工资增长都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实际工资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较低工资水平的一种补偿,但如果没有更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做后盾,那么,这种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它迟早会对本国的竞争力和长期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已经极大地动员中国经济在过去发展阶段所具备的各种要素。中国在改革期间通过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收获了很大的人口红利,来自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丰沛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大约在1/3左右。一旦人口转变完成,这种特殊的经济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在人口红利尚未消耗殆尽之际,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这就意味着未来10年左右,是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的最后机会,也是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机遇期。

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将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因此,确定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不仅不会淡化加快经济增长的目标,反而会使经济增长目标更加有保障,更有利于保持持续、高速、协调和健康的经济增长。

加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加快物质资本积累关键在于提高投资效率、培育和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因素,不仅可以继续保持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提高劳动配置效率,而且还能收到缩小城乡差距的功效(Whalley等,2004)。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包括全民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两个方面。改革教育体制,加强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衔接,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既可以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又可以培养满足市场需要的人才,提高个人的就业能力。加快人力资本积累,还需要加大对教育和卫生健康的公共投资,改善目前人力资本公共投资不足的局面。随着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和建设形成创新型的国家,这样就能保持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同步增长,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克服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实现人口、自然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蔡昉主编(2006):《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蔡昉、王德文(1999):《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第10期。
3. 郭志刚等(2006):《中国当前生育水平与未来人口展望》,载于曾毅等主编:《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彭秀健(2006):《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人口研究》,第4期。
5. 乔虹(2006):《中国是否未富先老?》,高盛全球经济研究报告系列第138号。
6. 王德文等(2004):《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人口研究》,第5期。
7. Lewis, W. Arthur(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2(May), 139-191.
8. Peng, Xiujian(2005), Population Ageing,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 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Volume 1, Number 2/July, 169-188.
9.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4 Revision and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p>, 10 November 2006(Medium variant).
10. Wang, Dewen, Fang Cai and Wenshu Gao(2006), Globalisation and the Shortage of Rural Workers: A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Globalization and Labour Mobility in China*, Nielsen, Ingrid, Smyth, Russell and Vicziany, Marika (eds), MAI Press.
11. Wang Feng and Andrew Mason(2005),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Prospect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hanging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Mexico City, August 31-September 2.
12. Whalley, John and Shuming Zhang(2004), Inequality Change in China and (Hukou) Labour Mobility Restric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1068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3. World Bank(2005),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Factor Markets: Economic Benef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Report No. 31973-CHA.

(责任编辑:朱犁)

role for composition and a predominant role for rising between and within-group prices in explaining the parallel growth of upper and lower-tail inequality.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Supply and Labor Demand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w Fertility Era

Wang Dewen ·44 ·

As Chinese population growth enters the low-fertility phase, its slow growth will finally cause the slow growth of labor supply. If China maintains its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e decline of working age population share and absolute number will trigger wages risi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rising labor costs and heavy population aging burdens, ensur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will depend largely on how to speed up both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how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labor productivity, and how to transform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ural China

Chen Lizhong Zhang Jianhua ·53 ·

Based on the properties of the poverty elasticity of income growth and the poverty elasticity of income inequalit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conomic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on poverty reduction at different initial income levels, and the effe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poverty at different initial income levels. This paper also estimates the elasticity of poverty by using China rural income data. Finall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poverty reduction speed under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suggests a pro-poor growth policy.

Marginal Fertility Decis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 Testing the Leibenstein's Theory

Ren Qiang Fu Qiang ·60 ·

Since Malthus presented his the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growth has been under sharp debating. Based on the county-level panel data of Hunan province, China, from 2001 to 2004, we constructed a linear logarithm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se the determinants of local multi-children rate and to test the theory of Leibenstein and finds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very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multi-children rate. Meanwhile, other factors, like the income and the non-agricultural sector expansion, may have asynchronous effects on their marginal fertility decision, which calls for attention of the policy-makers.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the 1990's China

Yan Shanping ·71 ·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1990 and 2000 Population Census and the 1% Population Sampling Survey in 1995 to investigate the scale, direction and structure changes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since 1985. We refer to the economic theory on migration and try to establish an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model, and then propose several hypotheses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ate of movement and other factors reflec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Finally, we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relative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arketization level, unemployment rate, spatial distance, information about work, on the rate of movement by employing an econometric method.

Coordinated Layout of Satellite Cities in Regional Planning :Model and An Empirical Study

Xu Ying Zeng Di ·78 ·

Accompanying with urbanization, the planning of satellite cities becomes a significant issue, which is considered by some scholars to be irreplaceable for resolving the over-expansion problem of central cities. Based on the existing theorie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new control system model of satellite cities that determines the optimum number and scale of satellite cities,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pressing demand of satellite city planning. This model is used in an empirical study for satellite city plan of Beijing's suburb.

Pensions, Retirement, and Models :A Review Essay of American Retirement Models

Che Yi Wang Yuanyue ·86 ·

The effects of social security and pension on retirement have been an active subject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works after World War II in US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empirical models of retirement in USA, such as nonlinear budget constraints model, option value model, dynamic programming model, probit and logistic model and hazard model. The models are referential to the empirical study of retirement in china.